

广东就业市场新景：制衣厂老板排队等着被工人“挑”

从“老板挑工人”到“工人挑老板”折射的经济现象值得关注

本报记者车晓蕙、黄浩范、周颖

进入三月，广州气温飙升，已渐显暑热气息。与天气一样火热的，是位于一些城村中的街边就业市场。这些地方成为小型工厂和外来工相互挑选、匹配的招工聚集地。

位于海珠区的中大布匹市场附近的城中村内，一条“招工长龙”与人们常见的不同：这条长约3公里的马路两旁，挤满举着招工牌子的制衣店老板，等着被工人“挑选”。

作为全国最集聚的“前店后厂”式布匹制衣市场之一，这里聚集了上万家以小作坊为主的商户、10余万外来务工者。

从“老板挑工人”到“工人挑老板”，是用工市场出现了倒置吗？工人为何喜欢“日算日结”式的街边就业？这一现象折射了哪些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老板为何排队“被挑”？

春节后，是制衣业的传统旺季，而经历了去年疫情的惨淡，中大布匹市场的节后旺季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更猛。

进入三月，一家家布匹、服装、面料档口已全部开张经营，到处人头攒动，拉货的小板车像小蜜蜂一样，来回穿梭在档口之间。

早上8点半，在位于康乐桥附近的康乐中约南新街，道路两旁已经站满了招工的制衣厂老板。他们拿着各种衣服样品，举着“四线”“平车”（制衣的不同工序）的招工牌子站在路边吆喝。

人行道的两旁站得密密麻麻，难有“立足之地”，耳边充斥的全是工资议价的声音，还有被人堵着不停催促的刺耳喇叭声。

站在招工人群中的许姐是一家制衣厂和烫钻厂的老板。她说，去年受疫情影响，国外没有订单，国内服装业受挤压，靠低价抛售才挣回材料钱，生意很难做，几乎要关门。但今年春节后，市场迅速回暖，客户往往是“今天下单，明天就要货”，人手根本忙不过来。

“单太多做不完了，老板就会多找几个工厂一起做。所以这里上午招工人，下午招客户，白天晚上都在不停地生产。”连续熬夜的许姐虽然疲倦但精神亢奋，见识过去年的萧条，这嘈杂的马路、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声，还有自家工厂日夜不熄的灯火，让她感到踏实。

围绕中大布匹市场，周围的城中村自发形成了密集的制衣小作坊，大的租下一栋农民房屋上二三十名工人，小的就一个房间夫妻两人两台缝纫机。这些作坊主要承接工厂的外包单，是制衣产业链的“神经末梢”。

大大小小的工厂、作坊催生了对制衣工人的大量需求。这里的马路就业市场已存在多年，制衣工人多来自湖北省，因此这里也形成多个“山寨客运站”，点对点往返湖北仙桃、洪湖等县城。过去这个马路市场已经是供求两旺，但今年多重因素下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井喷。

“大河有水小河满”。去年此时，制衣业因疫情一片惨淡，但今年春节后市场迅速回暖，一些大厂做不完的订单，很快流进这些小厂里。元宵节前后，订单充足和工人返乡未返城的时



制衣作坊老板坐在海珠康乐小学门口，手里拿着衣服样品，等待工人上前询问。 本报记者黄浩范摄



广州中大布匹市场附近，许多厂家在路边排成长队招客户。 本报记者周颖摄



工人除了挑老板，也会看衣服样品。 本报记者黄浩范摄

间差导致招工难被急剧放大。

工人为何喜欢“日清日结”式打零工？

29岁的徐文格和31岁的金佳是湖北老乡。两人下午2点多出来，站在康乐桥附近招零工集中的片区。不到3点，他们就与一个举着“四线”招工牌的老板谈妥了工价，进了加工作坊。

老板为两人找好机器、工位，简单招呼三五句话，又忙着出去点货了。徐文格熟练地在机器上串好线头，开始上手忙碌，差不多一两分钟他就能做好一件衣服。然而，做了不到半小时，徐文格就招呼金佳“走人”。

“做服装行业，主要靠计件算钱。这里每件的工价是1.5元，价格还可以，快的话一天做300件就能挣四五百元。但这里的布料

边太窄，做不快。这样一天算下来就挣不到多少钱，不划算。”徐文格说。

徐文格来广州服装行业打工已经有10多年了。他说，从2015年开始，他就不进厂，专门打零工。“进厂是稳定点，但工时长，不自由。现在打零工，自己说了算，不开心就换一家。反正靠劳力计件算钱，勤快点，挣的和在厂里差不多。旺季一个月能挣上万元，淡季也能挣四五千元过生活。”

中大布匹市场为大量制衣作坊和临时用工市场提供了“土壤”。据记者观察，这里上万家商户从事的主要是制衣行业的末端工序，如缝合衣袖领口、熨烫、锁边等。这些工序难以自动化，珠三角一些大企业就把能量产的块状部件生产好后发往这些小作坊进行最后的整合，减少对人工的依赖。而大量的小型工厂、制衣作坊也成为产业链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与此同时，康乐村这样的城中村也为制衣作坊和工人们提供了低廉的生活成本。这里的床位一般12元/晚，三荤一素的盒饭15元，吸引着他们长期驻扎在此。

据不完全统计，中大布匹市场附近聚集了上万家制衣商户、10余万外来打工者。

招用工“供求两旺”的隐忧

傍晚，记者跟随打工者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走进这片城中村的“握手楼”内，四川籍老板张华辉的制衣加工厂就位于其中。

一个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店铺被分隔为上下两层，一楼一张十多米长的大桌子上堆放着工人刚锁好边的衣服。二楼十几台机器两排摆开，几个工人正在埋头忙碌地缝纫。

“我们这里长期工人五六个，更多的是招零工，按日结算工钱。”张华辉说，服装行业淡季明显，一般春节后是一年行情最旺的时候。招长期工不划算，零工可以缓解一时的用工不足。订单少的时候，又不用养那么多人。

“前一段时间，工人没回来，订单又多，招工确实难。元宵节后，大部分工人都回来了，现在招工好多了。”张华辉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说。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这里招用工供求关系能实现大致平衡，但往长远看，用工和打工者都各有隐忧。

从工作性质上看，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制衣作坊手工作业占比重，要求长时间工作，不为年轻人所喜。张华辉不愁眼下招工，但认为招工一定会越来越难。“无论在工厂还是作坊里，坐在机器面前重复劳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现在的90后年轻人，家里条件比上一辈好，不愿意吃这个苦。”

与此同时，从事制衣并非简单重复劳动，属于技术活，需要投入成本学习练习。28岁的制衣工张展雄说，这行没地方学，都是靠亲戚朋友带在身边教，手笨、手慢还不如别的行业来钱快，“我年纪轻轻就做出身职业病，真还不如送外卖轻松。”

行业利润的缩减也让小作坊业主叫苦不迭。替家人招工的周玉兰说，加工一件女士长袖赚10元，要给工人8元。现在广州的房租年年喊涨，也时传出城中村村要拆迁，“我都50多岁了，不想干了，回家做别的去。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来都是给房东打工。”

让“神经末梢”健康、活跃

制衣业马路市场“丰年”之下尤其热闹，“订单催人来”反映了整个行业复苏，带动全产业链订单旺盛，产能提升，节奏加快，是经济全面回暖复苏的可喜征象。

数以万计的制衣作坊，就像这个行业的“神经末梢”，在疫情冲击下显示出很强的市场灵活性：疫情来临时很多小作坊“就地卧倒”，关门停业的成本最低，而市场一旦恢复，又能迅速组织生产，“春风又绿江南岸”。

与此同时，大量灵活就业人员“东家不打打西家”缺乏保障等隐忧，也呼唤制度上尽快研究对策，让这些“神经末梢”保持健康、活跃。

徐文格说，自己长期打零工，虽然月收入好的时候上万元，但长远没保障，作坊主是不会给买社保的。“除了一些成规模的大厂会给工人买社保。像我们，就只能等攒够了钱，自己买社保，自己给自己保障。”

记者采访多位作坊主发现，雇佣零工都是灵活就业，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福利保障。这就意味着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变成社会兜底，包括安全生产中的意外伤害、工伤事故，以及工人年老后的社会保障等。

“神经末梢”是机体中的关键组织。从制衣产业链来看，尽管近年来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化趋势明显，但大量末端工序无法智能化，灵活用工的作坊式制衣厂成为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越是活跃，灵活就业者往往就越多。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经涉及两亿人。面对这一趋势，应该从体制机制上，为这个群体提供更多有效的保障。

昆山：企业“花式用工”应对招工难

本报记者刘巍巍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制造业大市江苏昆山采访发现，结构性供需矛盾与疫情影响交织，依旧有大量企业面临用工紧张，甚至一工难求。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工资跳升如拍卖

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子制造业集聚区，昆山企业数量庞大，常年用工总量需求超百万。每到春节后，劳动力市场的高流动性和“时点性”矛盾，困扰不少企业人士。

“在手订单依然强劲，眼下的繁忙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用工缺口有数百人。”立讯精密工业（昆山）有限公司人事经理王猛说。

昆山人力资源市场集团负责人陈琦介绍，由于电子制造业产品更新的周期性特点，导致企业用工“潮汐式”特征明显。每年8月至11月，以及春节前后，是昆山电子制造业生产高峰期，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多年呈爆发式增长。

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负责人坦言，“遇到用工荒时，只能通过人力资源中介招临时工来应急”。

“这部分临时工群体相对年轻，喜欢非固定工作的自由模式，技能成熟度上不如固定工人，

而企业需要支付的成本却比正常用工高。”观察人士分析认为。

“21元、23元、25元、28元……”时薪节节攀升，就像在拍卖一样。”昆山一家台资企业高管无奈地说。

事实上，用工企业除了为临时工支付水涨船高的时薪外，还要加付高昂的“返费”。不少企业为保住大客户，往往是赔钱赚吆喝。

记者调查发现，当下“90后”“00后”新生代务工人员，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流。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些年轻人不安于固定上下班模式，对工作要求表现出弹性化、兼职化趋势，在个人兴趣、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资报酬等方面呈现多样化需求，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

有人盯上招工“返费”

记者近期走访昆山多个公办人力资源机构发现，现场咨询的求职者寥寥。一家电子企业招聘10名操作员，不仅开出了4000至6500元的平均月薪，还推出2280元的直招奖励，但乏人问津。

位于京沪高铁昆山南站附近的一处商业街内，却是门庭若市。这里集聚着多家劳务中介，记者走进其中一家，里面坐着二三十名提着行李的务工者。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务工者已经提交了求职申请，正在等待工厂的招工车辆。在毗邻的另一家中介内，记者同样发现求职者争先恐后地报名。

记者观察发现，这些劳务中介推出的岗位，大多是昆山当地及周边代工厂的普工岗位，对于求职者的学历、技能要求不高，但大多有着丰厚的“返费”。比如，在一家劳务中介内，某龙头台资企业的招工“返费”达11500元，但要求“工人需入职90天，打卡55天”。

同时，为了吸引求职者，劳务中介推出了“报到1000元”“上车700元”等五花八门的奖励。

现场一位求职者表示，他就是奔着“返费”和奖励来的，“只要钱到手，我就离职，再找其他家，继续‘薅羊毛’”。

昆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孙旭明认为，民营职业中介普遍采用“合同工+派遣工”的用工模式，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新生代求职者工资日结周结的需求，但存在着供需无序，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

陈琦认为，针对企业吐槽颇多的高“返费”问题，要由人社部牵头，联合多部委，研究制定相关政策，结合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企业用工规范，并对涉嫌扰乱劳动力市场秩序的劳务中介及企业负责人进行

约谈。

“花式用工”异军突起

灵活就业人员变身个体工商户，借助互联网平台服务用工企业；生产型企业与服务企业共享员工，餐厅服务员走上生产线；员工戴上智能眼镜，居家即可检修车间设备……面对用工难用工贵，昆山不少企业也在积极应对，灵活用工、共享用工、分时用工等全新就业模式持续走强。

位于昆山高新区的好活（昆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将分散的人力资源化零为整，开发出“创业式”用工方式。截至目前，已经吸引60多万名灵活就业人员注册。

公司创始人朱江介绍，通过好活平台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后，企业将用工需求发送到好活平台，平台通过自身技术能力分析，将用工业务精准匹配到个体工商户，既提高了灵活性，又降低了用工风险。

王名龙原本是一位美团外卖骑手，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取得了市场主体身份后，不仅缴纳社保更加方便，还能合理合法地享受国家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

疫情以来，昆山爱杰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生产线上，出现多名餐饮服务员工。原来，这

是该企业与昆山老阿爸餐饮有限公司合作的共享员工。餐饮服务员工经培训后，错峰走上汽车配件生产线，激活了餐饮公司闲置劳动力，化解了爱杰姆公司员工短缺难题。

在昆山张浦镇德国工业园绿色孵化基地内，通过引进AR眼镜“黑科技”，帮助佩戴者快速搭建远程多端实时应用。据运营方介绍，有了AR眼镜，一些因疫情无法现场办公的专家和高级工程师，可在线指导员工检修设备。

为解决企业用工燃眉之急，昆山人力资源市场集团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与10多个省份洽谈合作，建立3个省级人力资源开发基地，构筑了规模10万人的“蓄水池”。

在产业转型和用工紧张双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提高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在富士康昆山吴江江厂区，“无人工厂”初具雏形，数千只机械手驻扎进流水线；昆山三一重机小型挖机结构件生产车间繁忙的生产线上，焊光闪烁，而工人数量并不多……

但江苏一家机器人公司的负责人表示，仍有部分企业出于产品结构、资金投入、经营效益等考虑，对于机器换人或人机协同的迫切性和积极性不高。建议从政策激励、税收减免等层面，鼓励企业加快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